

以身许国的古代英豪

□ 石志刚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具有浓厚爱国情怀的名臣勇将，他们由对自己小家的热爱转化为对国家的忠诚。这份忠诚包含了持之以恒、全心全意、九死不悔、舍生取义等丰富内涵。他们身上的精神，熔铸为伟大的爱国主义传统，成为激励后世国人英勇奋进、爱国为国的宝贵精神财富。

以身许国的祖逊

东晋名将祖逊出身于多慷慨悲歌的燕赵大地，身上流淌着燕赵之士粗犷奔放的血液。其为人“性豁荡，不修仪检”，又“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祖逊喜好结交朋友，且能做到乐善好施，经常以其兄的名义将谷帛之物捐赠给乡党之族，“乡党宗族以是重之”。祖逊在十四五岁后开始博览群书，具备了“赞世才具”。

祖逊的青年时代是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度过的。当时，恰逢“八王之乱”、匈奴起兵进入中原，北方处于大混乱之中。年轻的祖逊和好友刘琨在司州共事，他们关心国事，议论到深情处，慷慨激昂。“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思念国事殷切的祖逊晚上经常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忽闻远处传来鸡鸣之声。祖逊骤然推被而起，披好衣服，唤醒身边的刘琨，两人取下刀剑，走到屋外，在月光下一起舞剑。此后，祖逊和刘琨养成习惯，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每日闻鸡鸣之声，必起床练习舞剑，从不中断。闻鸡起舞的事迹从此广泛流传，这个成语寄寓了他们希望练好武艺，才能日后更好地驰骋疆场、报效国家的精神。

西晋灭亡前夕，祖逊也像其他贵族官僚一样避难江南。祖逊在避难江南途中，他热心照顾同行之人，拿出自己的衣服和药物，给那些老弱病残之人。他还能够给避难之人讲解国家

大事，成为大家推崇的对象。当时司马睿委任祖逊为徐州刺史，虽然当时他远离战乱，但是心中仍然惦记着中原的父老乡亲，“以社稷倾覆，常怀振复之志”。祖逊屡次请求司马睿派自己北伐收复中原：“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大王诚能发威命将，使若逊等为之统主，则郡国豪杰必因风向赴，沉溺之士欣于来苏，庶几国耻可雪，愿大王图之。”

听了祖逊的言辞后，司马睿任命祖逊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调拨给他粮饷，因没有兵源和武器，让祖逊自己设法筹招。祖逊积极整编从北方来的宗族乡亲，组成一支队伍。公元313年8月，组织率军渡江北伐。当船至长江中流的时候，祖逊望着滔滔江水，立在船头，用木浆猛然一击发带道：“祖逊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这段话表明了他不收复中原誓不回江东的决心。祖逊一路北上，其部队也受到北方人民的热烈欢迎。

祖逊通过出奇兵，一路过关斩将；出奇谋，一路整合资源，化敌为友，使“黄河以南尽为晋土”。在北伐途中，祖逊不仅拥有军事之强，而且还能劝课农桑，展示出深远的政治家战略风采。祖逊亲自负担樵薪，不仅解决了粮饷问题，而且还为当地百姓创设了一个较为安定安居的环境，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爱戴。年纪大的当地百姓带着酒水来款待祖逊，而且还编好歌曲赞美祖逊：“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

祖逊奋力北伐，而且得到北方人民的支持，还取得了一定成就。正当祖逊准备乘胜前进的时候，司马睿已经在江南建立了东晋政权。偏安江南一隅的司马睿担心祖逊在北伐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的声望和逐渐累积的势力对他执政构成威胁。于是，司马睿派亲信戴渊充当都督，统管北方六州军事，以牵制祖逊。司马睿的这一行为极大地挫伤了祖

逊北伐的积极性和爱国心。祖逊忧愤懣，积劳成疾。祖逊在得病期间，仍“图进取不辍，营膳武牢城”。在祖逊56岁的时候，他去世了，临终之前，悲愤地说：“天欲杀我，此乃不佑国也。”祖逊去世后，豫州的百姓“若丧父母”，有的地方还给他立生祠。

举家为国的高睿

唐代名臣高睿出身名门，通过自身努力，“明经及第”，考取功名后，出任四川通义县令，任职期间，“有治劳”，当地百姓感恩其政绩，为其刻石载德。后来高睿被提拔为赵州刺史。当时，东突厥在阿波可汗领导下逐渐走向强大，在与唐朝虚与委蛇过程中时常骚扰唐朝边境，给唐朝边境百姓带来巨大困扰。公元698年9月11日，阿波可汗率东突厥部队围攻赵州，赵州刺史高睿据守城池。

在东突厥部队进攻赵州之前，持投降论调的人就告诫高睿，东突厥实力强大，所向披靡，所到之处，人们闻风丧胆，不能抵御，不如您放弃抵抗，还能保全全家性命。高睿严词回绝：“吾为天子刺史，不战而降，其罪大矣。”拒绝向东突厥投降的高睿在敌人强大攻势下和内部叛徒投降献城情况下，看到赵州即将沦陷，自己没有尽到守土职责，于是选择同夫人秦氏一起服毒自杀，结果自杀未遂，被东突厥俘虏。

阿波可汗为了劝降高睿，便派人将高睿夫妇一起抬到军帐，拿出金狮子带和紫袍，对高睿说：“降则拜官，不降则死！”此时的高睿看看妻子秦氏，秦氏坚定地说：“君受天子恩，当以死报，贼一品官安足荣？”于是，高睿夫妇闭口不言，等待就死。阿波可汗仍然不相信高睿夫妇的选择，于是将二人看押起来，假以时日，加以考察，以促二人改变主意，结果二人仍然坚持原志。

阿波可汗看到高睿夫妇不会投降，于是将二人处死。

舍孝为国的赵苞

东汉名臣赵苞在地方为政期间，不仅治绩卓越，而且敢于担当。他以其堂兄宦官赵忠之行为耻，遂断绝与其关系。当时，北方的鲜卑族逐渐强大起来，成为侵扰东汉边境的一大麻烦。为了更好地抵御鲜卑族进攻，赵苞从扬州县令任上被提拔到当时东汉与鲜卑交界的辽西当太守。

赵苞在辽西太守任上的第二年，便迎接自己的母亲和妻子来辽西。当赵苞的母亲和妻子走到离辽西不远的柳城时，遇到了前来扰民的鲜卑军队万余人。鲜卑军队就此劫持了赵苞的母亲和妻子。当鲜卑军队得知这两人身份后，非常高兴，认为可以当作是要挟赵苞放弃辽西的最大筹码。

随后，鲜卑军队来攻打辽西，辽西太守赵苞率军出战。两军对峙之时，鲜卑军队狡猾地将赵苞之母推到阵前，以期达到动摇赵苞部队军心、瓦解赵苞部队斗志的目标。赵苞痛心地对其母说，作为儿子的我，本应该以微薄的俸禄侍养自己的母亲，没想到却为母亲带来了这么大的灾难。痛定思痛后的赵苞对其母表明了自己为国家而死的心迹：“昔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唯当万死，无以塞罪。”

深明大义的赵苞的母亲对着赵苞说：“威豪（赵苞字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顾，以亏忠义！昔王陵母对汉使伏剑，以固其志，尔其勉之。”信奉“为下克忠”的赵苞在母亲的鼓励下，率部队进攻鲜卑，打败了敌人。然而，他的母亲和妻子都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赵苞收殓了母亲和妻子的尸体，回老家安葬了他们。赵苞常常为母亲和妻子的牺牲而难过，最终咳血而死。

丹心一片悬书院

——张之洞致丁宝桢信札释读（三）

□ 刘凤桥

张之洞在信件的第三部分谈到了两件具体的事情：“更有启者，侍在蜀刊有《轺轩语》、《书目答问》二书，以示蜀士，虽涉谗陋，颇具苦心，濒行时将版片寄往湖北，蜀士闻知，谬恩重刻，因于西安途次寄去百金，嘱薛监院转交肄业生杨锐等五人，即日觅工重刻，经理督催，嘱杨锐总司其事。乃至今尚未刻出。闻止刊成数版，工亦粗率。其百金之款亦未付于杨生，实堪怪诧愤懣。窃思此举乃侍自出私钱，责成杨生料理，他人掣肘何为？敢恳谕飭两监院交出此项，专属杨生，迅速刊毕，如有不敷，望即将侍太原寄上之款，发交杨生应用，是所至祷！”

“再：《尊经书院记》，侍曾微令勒石，闻尚延阁，亦请飭催监院办成。感幸感幸！”

“廉颇思赵，耿耿于怀，伏惟鉴之。”

“侍还都数月始得定居。词曹无事，稍可休息。惟久劳伤脾，夏秋以来，时有不适，艰于执笔作书，致稍裁报，罪甚罪甚！兹因人使，肅此隄陈，敬请勘安不尽。侍之洞顿首。九月十五日。前后函共十一纸。”

请丁宝桢督促刻书勒石事宜

从文中可以看出，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专门为尊经学院学生撰写了指导读书门径的著作，即《轺轩语》《书目答问》两书，这是张之洞早期学术思想的姊妹篇。由于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很受欢迎。可能是张之洞离开四川时，欲“将版片寄往湖北”，尊经书院的学生们知道后，“淳厚重刻”，张之洞很受感动，自己出资，“嘱薛监院转交肄业生杨锐等五人，即日觅工重刻。”“经理督催，嘱杨锐总司其事。”但不知为何，重刻进展很慢，质量也差。更令张之洞恼火的是，他奉上的刻书费用，没有按照他的意愿使用。所以，他希望丁宝桢过



首次发现的张之洞致丁宝桢信札

问此事。“敢恳谕飭两监院交出此项，专属杨生，迅速刊毕。”

有学者认为，张之洞早年的督学成绩，不出阮元、曾国藩等儒学名臣提倡经古的轨迹；而在与内地风气磨合的过程中，又须对庞杂的学术整体进行整理，条列其要点，铺陈其门径，相对于《皇清经解》《四库提要》所代表的高端知识，《轺轩语》《书目答问》等门径书的缓冲作用洵为重要，甚至充当了康有为、梁启超、顾颉刚等许多近代以降学者修治经史的津梁。

就是这样颇受欢迎的两部书，在其刊刻的初始阶段，也并非一帆风顺。这也是这封信提供给我们的另一种特殊价值，即为研究《轺轩语》《书目答问》的出版情况，提供了有趣的第一手材料。

第二件事是《尊经书院记》勒石的情况。

《尊经书院记》是张之洞在《尊经书院章程》前面写的一篇长记，亦称学规。是研究张之洞早期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此记内容精要，涉及书院本义与学术教条大端，是尊经书院的灵魂。按照张之洞信中的说法，当时，他曾“微令勒石”，目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晓明书院宗旨，传达办学理念。但不知为什么，他的这一命令一直“延搁”，没有得到院方很好落实。所以张之洞请求丁宝桢帮他过问一下，抓紧“办成”。

书信第三部分所陈刻书，刻石两件事情，看似是张之洞个人的私事，实际都与尊经书院的建设有关。正因为如此，张之洞说话的语气果决而不容商量，甚至很有些“怪诞愤懣”的情绪。这也说明，离任后的张之洞与书院主事者之间似有不融洽的地方。不知张之洞对主讲人选的极力推荐，是否也与此有关。

书信的第三部分还有个重要的人物

值得一谈。就是张之洞信中所说的杨生杨锐。杨锐（1857—1898年），字叔峤，四川绵竹人，以举人授内阁中书。后由陈宝箴推荐加四品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戊戌政变后与谭嗣同等同时被害，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杨锐少年即受知于张之洞，后来一直为张之洞所倚重。从信中张之洞将刻书一事“交付杨生总司其事”来看，应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杨锐就已经成为张之洞的嫡系，开始为张之洞办事了。所以，书信中的这段内容，也是研究张、杨交往初期的重要史料。

张之洞的谨慎

张之洞比丁宝桢小17岁，无论是官阶、资历声望，当时还都不能与丁宝桢相提并论。所以，张之洞在信中始终以学生或部属“侍”的身份自称。尽管身居晚辈，但张之洞始终不卑不亢，表现出一一种从容成熟的处世风格。此外，张之洞接到了丁宝桢来信后，迟至数月才予以回复，用他的话说，是身体“不适”“艰于执笔”的原因。笔者认为，真正的原因，很可能是他要观望一下丁宝桢入川之后的情势，权衡一下要不要说？说什么和怎么说？还有，就是没有合适的人带信。怕泄漏信中的内容。直到有了合适的人带信，他才“肃此缕陈”。但即便如此，在单独开列“川省积弊”的两页废纸后面，张之洞还是特别标注“此二纸付丙”，即烧掉的意思。由此可见张之洞心思的缜密和对官场险恶斗争的警惕。

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丁宝桢最终并没有将这封密信销毁。从而为后人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让今天的我们仍然有幸透过纸色墨香，依稀看见那一百多年前的世态风景、如烟往事……



在宋词的星空里，晏殊无疑是闪耀得最早而又最亮的那颗，他开创了北宋婉约词风，被称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倚声家：按照词调作词的名家）。其《蝶恋花》中：“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玉楼春》中：“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踏莎行》中：“高楼目尽欲黄昏，梧桐叶上萧萧雨”；等等。这些皆为千古绝唱，遂成一代词宗。

然而，后人不太熟知的是，晏殊不仅是一个著名的词人，更是一个产量高到惊人的诗人，宋祁在《笔记》一书中说：“天圣初元以来，缙绅间为诗者益少，唯丞相晏公殊、钱公惟演、翰林刘公筠数人而已。晏丞相末年诗，见编集者乃过万篇，唐人以来未有。”为何“为诗者益少”？正如清人潘德舆所说：“词之有北宋，犹诗之有盛唐”，大都填词去了罢。而晏殊开创词界新天地的同时，做诗益勤，到他晚年，见诸诗集的竟逾万首之多，有宋一代，恐怕只有“六十年间万首诗”的陆游可望其项背。

不过，晏殊所作的万余首诗，却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书籍的佚亡，大都散失，未能全部流传下来，《全宋诗》中仅录晏殊诗160首，相对他海量的创作，简直如沧海一粟，难以饱览他诗歌“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磅礴气势和瑰丽美景。

元朝脱脱曾在《宋史·晏殊传》中评价他说：“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对晏殊诗歌质量的评价，竟然盖过了他为人所称道的词，让人诧异。不过，通过晏殊存世少量的诗歌，我们亦能窥其堂奥。宋初的诗流行“西昆体”，师法李商隐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但东施效颦，过了头，导致诗歌窒塞而气闷，浓艳而呆板。

晏殊虽然也学李商隐，但他懂得分寸，每每清新活泼，情思幽妙。如《无题》：“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瑟禁烟中。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写怅然若失的思念，写得缠绵悱恻而又含蓄幽深，真挚而又又不渲染过度，句句敲在人心上。

晏殊作诗，是极讲究锤炼词句的，与贾岛的“推敲”异曲同工。欧阳修《归田录》载：“晏元献（晏殊谥号元献）善评诗，尝云：‘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这是晏殊批评寇准“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句堆金砌玉，全然不是真正的富贵气象，不如白居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不着金玉一字，富贵气却扑面而来。

从这种批评和取舍中，既可看出晏殊对诗歌的好恶，更可以看出晏殊对诗歌词句有一种近乎“洁癖”的“苛求”，这种“洁癖”和“苛求”，也从侧面反映出他自己对待做诗的态度，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

晏殊名作中有一首《示张寺丞王校勘》，诗曰：“元巳清明假未开，小园幽径独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难禁滟滟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游梁赋客多风味，莫惜青钱万选才。”

是不是很眼熟？确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便是晏殊词作《浣溪沙》中的名句，不过，这不是晏殊以词句入诗，而是以诗联入词。清人纪昀等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珠玉词提要》载：“《浣溪沙》春恨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二句，乃（晏）殊《示张寺丞王校勘》七律中腹联……今复填入词内，岂自受其词语之工，故不嫌复用耶？”诗人忌讳重复，将自己诗中句子“移栽”到词中，无异于“自我抄袭”，历代少有。然而晏殊此

无可奈何花落去

□ 晏建怀

举，剑走偏锋，却又恰到好处，于不可为处而为之，起到了一举两得、锦上添花之效，颇令人意外，其爱词之工丽、爱句之精警的执著，亦可见一斑。

而“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句，又着实来之不易，说来还颇有一段曲折故事。宋人所撰《复斋漫录》一书记载了这段故事。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晏殊因公赴杭州，路过扬州，游览大明寺，在寺内诗板（题诗木板）前读到一首《扬州怀古》时，眼睛一亮，随即招来作者、扬州府江都主簿王琪一叙。正值暮春，二人饭后闲庭信步，晏殊看到满地落花，叹息道：“我有时偶得一佳句，却常常经年对不出下句，如‘无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无对，十分懊恼。”王琪应声道：“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一听，真是浑然天成的绝对，禁不住击节赞叹！回京后，晏殊立即将王琪聘为僚属，不久又推荐他出任大理评事、馆阁校勘。得一妙句便奖引人才，甚至不遗余力，恐怕只有晏殊这种对炼句如此痴迷的人才会这般的行事。

晏殊是一个成功的诗人，却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宰相，尤其缺乏担当。他太爱填词做诗了，常常影响了要务。宋仁宗庆历年间，西夏犯边，战事吃紧，晏殊时任枢密使，主持军务。他的学生欧阳修担心老师日理万机，太辛苦，便上门探问，但到了一看，老师却在莺歌燕舞、诗酒流连，欧阳修大失所望，后作《晏太尉西园贺雪歌》一诗，中有“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之句，批评老师在这国难当头之际，不应该花天酒地，闲如散官。

不仅彼时，在以后的日子里，欧阳修对这位宰相老师的微词一直没有改变。晏殊去世后，欧阳修在给晏殊所作的《挽辞》中便说：“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这已经是非常露骨的批评了。

晏殊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卓越的建树，但不可否认的是，晏殊殊才，奖掖后进，不遗余力，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孔道辅、韩琦等均出其门下，他们起于未名之时，均在晏殊的推介和提携下蜚声朝野，步步高升，后来或为名臣，或成名相，皆为一时贤俊，流芳千古。而就这一点来说，晏殊又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宰相。

